

『一大』卫士——王会悟

人们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的石库门与浙江嘉兴南湖的画舫里相继召开的“一大”会议上诞生的；然而，人们不全都都知道，那位应对突变、急中生智，使临时中断的“一大”会议从上海巧妙转移到嘉兴继续召开的神秘人物是谁。当在浙江桐乡乌镇游览时得知“这个神秘人物就是乌镇女杰王会悟”时，我惊喜地奔向王会悟纪念馆。

在乌镇西栅的观后街上，我很容易地找到古色古香、鲜艳亮丽的殿堂式古建筑，那原是王会悟家的故居，现布置成纪念馆。当门而立的巨幅《南湖风光与王会悟》的组雕：但见荷花摇曳的南湖上，泊着那艘美丽的红船；与红船紧紧相依、永远同在的，是一位剪着刘海短发、穿着大襟衣裳、配着黑色短裙、乳白短袜以及黑色布鞋的江南少女，她便是被誉为“‘一大’卫士”“党的第一位党务工作者”的王会悟。

“论起辈分，王会悟还是乌镇籍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表姑呢。”当年王会悟离开乌镇，进入上海，是茅盾先生安排的。王会悟的丈夫李达就是党的“一大”正式代表。王会悟在《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的革命回忆录中说：“党的‘一大’将要召开时，我的爱人李达把为大会安排会址和外埠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交给了王会悟成为大会的会务工作者，会议期间，从“博文女校”到“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0号李书城家中”再到“嘉兴南湖画舫上”等多变会址的择选，都是她一手完成的。

王会悟在回忆录中说：“出席党的‘一大’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可尔斯基。那天，李达要我把马林和他的翻译杨明斋护送到会场，然后在楼下照看门户。突然，一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我立即叫住他，问是谁？李家的厨师回答说，侄少爷的同学。我觉得蹊跷，上楼告诉杨明斋。马林警惕性高，问讯后拿东西走了。张国焘怪我大惊小怪，把会场搅散了。不久，法国巡捕来了。李汉俊用法语说：‘上午，我几个朋友讨论19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争论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未发现什么，就走了。事后，马林说：‘这个女孩子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上海不能开会了，到哪儿继续开会？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家乡的嘉兴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大家都同意了。我便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让他们带副麻将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游船上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了。”

关于那副麻将牌的情节非常有趣：说是“一大”代表们上船时，王会悟特意将一副麻将牌交给他们，并约定她一敲舱板，他们就打麻将。代表们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她始终坐在船头上放哨，见有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就哼起嘉兴小调，用纸扇柄敲敲舱板，代表们接到信号就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响，还“七筒”“八万”地喊着，让人真以为他们在打牌。

“一大”之后的王会悟一直从事着革命工作，参与创办我国第一个妇女进步刊物《妇女声》，创办过上海平民学校，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她的学生。解放初期，在政务院（后为国务院）从事法制工作，之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直到离休。1993年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红色印记 □江志伟

如歌岁月 □李良旭

1944年，全国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谱写了一曲保家卫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战歌。当时，父亲在新四军第七师骑兵排任排长，他骁勇善战，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

有天，父亲所在部队奉命进入到预定地点埋伏，准备袭击一小队去村里抢粮食的日伪军。战斗打响后，新四军英勇顽强，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突然，父亲的大腿被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受了重伤。战后，父亲被护送到当地一户村民家养伤。

这家是“堡垒户”，家里的几个孩子都参加了新四军和游击队。特别是这户人家的小女儿，虽然只有八九岁，却成为一名女游击队长。

因负伤，父亲有机会结识这位女游击队长。别看她年纪不大，做事却非常泼辣、果断，每天一大堆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带领乡亲们抢救粮食、站岗放哨，回到家，还为伤员换药、烧饭、洗衣。

一次，她给父亲换药时说道：“李排长，你将来找什么样的人做媳妇啊？”

父亲听了，脸红了，嗫嚅道：“找一个像你这样能打仗的女人当媳妇。”

她羞涩地嚷道：“要我当媳妇条件可高啊！”

夫唱妇随 □逢维维

婚后发现，他不会做饭，不会洗碗，厕所堵了不会疏通，电灯坏了也不会换，说他笨，还不服气，翻出我比他更笨的证据。

以前，他说要当我一辈子的管理员，会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好让粗心的我少些烦劳。可现在一吵架，我的丢三落四成了他攻击的武器。曾经的甜言蜜语像针扎在心上。疼！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大吵一架后，我回到了父母家。一进家门，爸爸正修他骑了一辈子的自行车，扒开外胎，小心翼翼地把内胎抽出来。

我气呼呼地说：“老古董的车了，修啥？丢了吧，我给你买新的”。爸爸笑道：“还是老的好，脾气秉性，我一清二楚，一听声音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新的还要重新磨合，用不顺手。”

爸爸把内胎放进装好水的盆里，“咕嘟”地冒泡，赶忙拿出车胎，然后用锉把有洞的地方用力地蹭平；再找块小小的内胎剪成圆皮，用锉用力地蹭出新的结合面，然后抹上胶水，粘在有洞的地方。

“你看，两块不同的胶皮，经过磨合，磨出新的结合面，这样黏在一起，才更加地牢固。”爸爸说：“破了的车胎，就像婚姻中发生矛盾的夫妻，补的过程就是相互磨合、相濡以沫的开始。”

“什么逻辑？”我说：“车胎破了，换条新的，省时省事。”

青萍絮语 □王厚明

台湾一档综艺节目，曾组织一次网络评选，评选哪位艺人最不受观众欢迎。一女艺人不幸“夺冠”，现场一公布，她崩溃大哭，场面尴尬异常。

一年长的男艺人突然说：“嫌货才是买货人。你看上街买菜的阿姨在菜摊前挑挑拣拣，‘老板你这菜不新鲜耶，你看有虫子咬过的痕迹，这菜怎么还带着泥。你给我称两斤’。如果对这菜不感兴趣，她们才不会停下来跟老板挑剔呢。同样，网友如果不关注你，他们才懒得投你一票。”说的那位女艺人破涕为笑。

台湾有句俚语：“嫌货才是买货人。”意思是说，嫌产品不好的客户才是真正的内行，也是对产品有购买意愿的人。如果对产品一点挑剔都没有，这个客户很可能没有购买的欲望。

“嫌货人”是爱批评和提意见的人。其实，这不正是有问题意识、对人和事有责任心的表现吗？经常提意见和建议的人，真是把单位当成家去爱护、把同事当成家人去真诚相待。能无顾忌地批评一个人、一件事，既是对被批评对象的高度信任和寄予期待，也犹显“嫌货人”

最美的定情物

父亲忙问：“什么条件？”她一字一句地说道：“那就要多杀鬼子、多立功，早日将日寇赶出中国。”

父亲听了热血沸腾，拍着胸脯说道：“等我养好了伤，回到部队，一定多杀鬼子。”

她莞尔一笑道：“那我就等着这一天！”

转眼几个月过去，在她精心护理下父亲的伤痊愈了，父亲又回到部队。在部队，父亲出生入死，英勇杀敌。每次打完仗，父亲都会将打死小鬼子的数量，用子弹壳记着放在随身携带的布袋里。

日本投降后，一天，父亲骑着战马回到女孩子面前，将手里的小布袋递给她，说道：“这是送给你的定情物！”

1944年，父亲的定情物，竟是一小袋子子弹壳。这份沉甸甸的子弹壳，让父亲和母亲心心相印，牵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每每看到父亲与母亲当年的这份定情物，我感慨万千，眼前仿佛又浮现当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峥嵘岁月。那是一段血与火的记忆，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永不磨灭……

“新的就不会坏吗？”“坏了就继续换呗，不就是钱的问题吗？”

“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爸爸很认真地说：“就算换新的车胎，在用的过程中，一样会遇到车胎破的时候，这时候，不能怪车胎不好，要想办法学会补车胎的技术，这才是根本。”

我气呼呼地说：“有补车胎的时间，干点啥不好？有磨合的时间，还不如重新找对人。”

“从你进家门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小两口准是吵架了，你的脸还没学会掩盖呢。”爸爸说：“夫妻之间性格合与不合，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相互磨合的结果，磨合正是相濡以沫的开始。”

这时，满面面粉的妈妈从厨房走了过来，对爸爸努努嘴说：“痒。”爸爸两手对搓后，才在妈妈的后背上挠着痒。

那幸福和满足，从妈妈满脸的笑容中溢出来，跌落进我的眼里。

望着父母幸福的模样，我双眼湿湿的，走到阳台，看窗外正开着如火如荼的木槿花。原来让我羡慕和感动的白头到老的幸福，却是他们在婚姻里千万次磨合的结果。

离开父母家，我决定和他好好“磨合。”相信在千万次的磨合中，一定会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历久弥新的幸福……

嫌货才是买货人

坦荡胸怀和真诚待人的可贵品质。他们如同亲人一样，都是自己人生中的“买货人”，为你的点滴进步而欣喜，为你的小错小失而忧心，时刻关心呵护着你。嫌货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关心，是一种情谊。

有这样几种“嫌货人”，值得我们敬重。“爱之深、责之切”的“嫌货人”，充满主人翁责任感，因对单位、工作或对人有太多向上、向好的期望，才会更高标准的苛求；“鸡蛋里挑骨头”的“嫌货人”，追求至善至美，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凡事总往坏处想”的“嫌货人”，他们充满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强，会把困难估计得很足，把矛盾考虑得很多，把隐患预想得深。我们有责任呵护这样的“嫌货人”，他们往往不识时务、不够圆滑，不讨人喜欢也易得罪人。然而，他们不会明哲保身、左右摇摆，却是忠诚事业、立场坚定的人；不会溜须拍马、曲意奉迎，却是敢于担当、刚正不阿的人；不会是非不分、真伪不辨，却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人，为他们撑腰鼓劲，何尝不是为我们的事业加油呢？

种好心中的树

况味人生 □王建强

那年，我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初中学校任教。要跟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打交道，我有些不适应，再加上几个调皮的男生故意在课堂上捣乱，搞得没法正常上课，我苦恼极了。

一天傍晚，我骑着自行车到郊外散步，正好遇到我上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他说他退休了，每天晚饭后都会出来散步。看我愁眉不展的，问我是不是遇上麻烦了。我老老实实地诉说了我的烦恼。

老师笑着说：“你正处于‘断奶期’，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老师边走边说：“从前，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里自然条件不好，到处是荒山，能种的地非常少。老百姓的脾气也不好，动不动就吵嘴打架。新上任的县令到村里暗访了几次，果然像传说的那样，老百姓三天两头吵架，且一吵架就动手，一动手就见血。县令于是下了一个命令，凡是动手打人者，一律罚他（她）到山上种树，打一次架，种一棵树，且必须种活，死一棵罚种两棵。刚开始，大批的百姓被罚上山种树，而且有的人几乎天天种树。一段时间后，这个村的治安越来越好。原先这里自然条件不好，耕地很少，老百姓整天无所事事、搬弄是非，吵嘴打架不断发生。可现在老打架就会被罚种很多树，搞不好倾家荡产，而种上树后，又怕树苗死掉，所以天天上山浇水。山上种的树多了，动物就来安家，有的村民开始上山采药、打猎，然后卖钱；有的村民实在没事干，就开荒种地。渐渐地，百姓富裕了。聪明县令的办法不仅改变了村里的环境，也改变了老百姓的命运。”

说到这里，老师看了我一眼，停下脚步，接着说：“你现在遇到烦心事，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如像这些老百姓一样，种树！当然不是让你真的去种树，而是在心里种树，树在心中种得多了，达到一定的境界，你的处境自然就变了。你教的是语文，可以每天写写教学心得，背背唐诗宋词，它们就是你在心里种下的一棵棵树。”

老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是啊！“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我何必为暂时的不顺利而烦恼呢？为什么不能在心中种下一棵棵的树呢？

从此，我每天如饥似渴地背诵古诗词，持之以恒地记录自己的教学心得。慢慢地，我在课堂上可以挥洒自如了，孩子们非常喜欢听我的课了，我的文章也频频见于报刊。同事们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说：“在心中种树，且一直坚持下去！”

“共生和暖土”

七彩时光 □潘爱姬

汪教授是我小学同桌。同是从泥土走进城里的人，我们的人生轨迹却不相同。他成了大学教授，而我大半生围着锅台转。

汪教授是研究物理的，无论说什么事情，都把物理的理论掺杂进去，我不能理解。我说锅台上的事情，他不感兴趣。但谈到种庄稼，我们非常地热爱。

住在城里说种庄稼似乎不现实。然而，汪教授还真地拿起了锄头，在城郊租了五分地。我说他会玩情调，想想他在海南买房避寒，南来北往“候鸟式”养老，日子过得多惬意。

汪教授开车带我们去参观他的“五分地”，我们大跌眼镜。“哈哈！这什么菜园子！毛乎乎一片，坑坑洼洼一滩。”我们要帮汪教授除去地里的草，可被他拦住了。

“我特地养的草，为给地里增肥和豆子保暖。”还有这样种庄稼的人，我诧异地说：“这地如在我手上，不睡觉也要把草除得干干净净。”

“你不懂，有些东西是共生的。它们虽互抢养分，但也相互保护。”汪教授指着两畦蚕豆说：“这是去海南前种下的，地里的草被我除掉了，怎么样？大都冻死只剩下几棵。那块地没被除草，瞧！长得多好。冬天里太冷，正是草保护了蚕豆。”

在事实面前，我们无语了。“我为啥不把菜地上的土刨平，也是为了菜们更好地成长。”汪教授继续阐述他的理论。“大凡生物都喜欢温暖，庄稼也是，暖土对它们的成长很重要。”

我小时就会种庄稼，却从来没听过“暖土”两个字，觉得很稀奇。“如果把地弄得平整光滑，是好看，阳光却晒不进土丛深处。像我这样让土疙瘩有高低，菜的根部可晒到太阳，高处的土也晒暖了。必要时，再把高处的土围到菜的根部，菜自然长得好。”

汪教授的一席话，对我们无地可种的人来说，没啥意义。他的那番理论是否有利于庄稼生长，我半信半疑。但那“共生，暖土”的字眼儿，却莫名地在我心里跳动——我们人类，不也是如那些庄稼一样，需要“共生和暖土”的吗？

家春秋

画中行 罗树妹 摄

